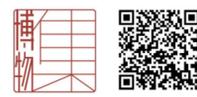




4月28日,“灿烂的记忆:亚洲文明古国金属艺术展”在成都开展。这场由成都博物馆、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展览,以亚洲各文明古国青铜时代至中世纪时期的礼器、武器、生活器皿、雕像、印章、饰品等金属器为载体,串联起金属艺术起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画卷,呈现出古代亚洲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差异性、相似性和互相交流的轨迹。

回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从原始社会的采集狩猎到农耕与城市文明的历程,也是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跃迁的过程。冶金,无愧是人类文明之火至关重要的助燃剂——金属的发现、认识、开采与利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祭祀礼器、战争兵器、农耕用具、生活器具……随着资源发掘和铸造工艺的不断发展进步,金属材料的使用范围也不断拓展。站在这片盛产青铜器的古蜀故土,一场文明古国之间的隔空对话,在一件件相似而又独特的文物的金属光泽中徐徐展开。



扫一扫更精彩



Culture & History
浣花

08

成都日报



2023年5月8日
星期一

金属器之光 映照古文明交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实习记者 王茹懿 供图 成都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

“偶像崇拜” 青铜与雕像

作为人类古老文明的摇篮之一,属今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科威特部分地区的两河流域之上,孕育出了充满神秘和传奇色彩的青铜时代。从约公元前3500年开始,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以及中亚阿姆河文明,便开始进行青铜器具的打造。

苏美尔文明最早的铜像,就出现在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早王朝时期,青铜立像可谓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一类器物。将神或国王的形象刻进青铜雕像,映射出此时期社会中,人们对于神权与王权的理解、表现。展览中,这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哈拉帕文明时期,来自印度河流域的跪姿女性铜像,虽然面容细节已模糊不清,但仍能从形态及面部神情中感受到其庄严肃穆的气质。据推测,这件青铜像可能与当地流行的某种女神崇拜有关。

在三星堆文明中,一座座威严站立的青铜立人、一件件夸张奇绝的青铜面具,也无不诉说着三星堆古蜀王国之中一种体系性的“偶像崇拜”现象。其中,最为震撼的当属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世界铜像之王”。这座通高2.62米,重约180公斤的青铜大立人像,在1986年一经出土,便震惊了世界。即便对于雕像的身份,学术界仍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总体来看,大立人通天异禀、神秘威严的形象,无疑是至高权力和无上权威的象征。

一个是小巧精致的女神铜像,一个是宏伟壮观的巨型立人,青铜时代,在相似的偶像崇拜之下,东西方古人的表现手法却大相径庭。实际上,在青铜器的制作技术上,中国与西方有着显著的区别。

为使用更少的资源材料,在小块金属上更好地雕刻出细部特征,西方的青铜铸造更多采用失蜡法制作:先用蜡做成铸件的模型,再用耐火材料填充泥芯、敷成外范。加热烘烤后,蜡模则熔化流失,然后往内注入

金属熔液,如此便铸成器物。因此,以失蜡法铸造的器物,可以达到镂空的效果。

与“失蜡法”相对应,“块范法”则是中国人常用的青铜铸造技术,也是中国青铜文化在技术层面区别于世界其他青铜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块范法”是将一件器物制成模型,再在模型外部用泥土做成外轮廓“外范”,将“外范”分成数块从模型上脱下来。同时还需要制作一个与器物内腔大小相当的“内范”,外范和内范组合之后,中间会有一定的空隙,称为“型腔”。最后,将铜液注入型腔,待冷却后,除去内范、外范,便可得到铸造的青铜器。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大量青铜器物上的合范痕迹,以及残留泥芯、泥范情况,均体现出块范法铸造成形的特征。



▲铜连枝灯 贵霜王朝时期(公元100年—300年左右)
▶三星堆青铜神树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
▼青铜女像 哈拉帕文明(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700年左右)



▲金沙遗址铜牛首
▼牛车 苏美尔早期王朝(公元前2500年左右)



“自然图腾” 神兽与神树

在对神灵与国王崇拜的同时,古人总是相信具有生命的动植物也是神明的化身,自然万物天生就拥有着独特的寓意和神秘的力量。于是,东西方不同的文明背景下,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图腾崇拜,古人运用自身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利用金属制造工艺,将这种信仰寄托在了形态各异的神兽与神树器具之中。

携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低语,那辆从4000余年前的洪荒中驶来的铜合金牛车,带来了人类文明中关于牛的形象,金属语言最早的表达。模型中的这一类牛车,在当时多用于宗教场合运送祭祀物品,夸张的大角牛是当时常见的表现手法。在印度河文明中,公牛亦是具有神性的形象,是伟大神力、强壮体魄的象征,主持献祭仪式的主祭司也被认为是公牛的化身。哈拉帕文明各遗址里,最引人注意的出土文物则是2000多枚印章,印章图纹中有许多颈背部凸起的瘤牛形象。瘤牛是印度河流域常见的用于农业耕作的牲畜,作为当时的宗教图腾被广泛崇拜,产生了深远影响。展览中,便可见一尊来自哈拉帕的青铜牛低头亮角,蓄势待发,充满了动感与力量。还有来自阿姆河文明的青铜牛头装饰别针,青铜牛

形化妆容器,以及光彩夺目的巴克特里亚王国金牛……

正是由于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传统社会里,牛是最常见用于作业的牲畜,因此,牛便成为劳作生产、繁衍生息与自然力量的符号——古蜀王国中,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里,以铜牛首、水牛首、人首牛耳像等出土文物为代表,可见这种对牛的图腾崇拜现象,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都十分广泛和显著。

如果说青铜牛更多是一种以动物本体为原型的艺术形象,具有写实和贴近生活的风格,那么由“狮子崇拜”衍生而出的狮子本体、斯芬克斯、格里芬三种主要形象则凝结着两河流域先人天马行空的想象,成为区别于现实中动物的名副其实的“神兽”。在当时,狮子用以象征王权和其他超自然的力量,格里芬则被各草原民族视为神圣力量。在苏美尔雕刻、埃及金字塔赫梯城门雕刻、希腊艺术中,斯芬克斯神兽形象十分常见。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王朝之下,斯芬克斯造型不尽相同,但其形象基础都是由人、狮子与鹰共同组成的人兽合体,有时还带有翅膀。而格里芬的形象基础则是头如鹰、翼似鹿、躯体像狮子的怪兽。这一艺术造型也被赫梯、亚述、波斯、斯基泰、塞种、阿尔泰等民族沿用,并深刻影响了我国北方草原艺术。钩喙蹄足,整体造型似鹿非鹿、似鹰非鹰——陕西神木匈奴墓出土,来自战国—西汉时期的“金怪兽”,就是斯基泰鹿形格里芬

向东传播的实物例证。

回到古蜀,各类神兽造型在出土文物中更是屡见不鲜。四翼小神兽、龙凤合体青铜走兽,以及去年8月于8号坑提取出的那件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动物造型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立人神兽……龙、虎、蛇、鸟、象等动物形象的混搭组合,诞生出一只只“个性鲜明”的古蜀神兽。

属于古蜀文明的众多青铜器具当中,那件世界已知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一号神树让人过目难忘: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条果枝,果枝上立神鸟。树侧有一条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辩的铜龙,整条龙造型怪异诡谲,莫可名状。卓然挺拔,有直冲云霄之势。这通高3.96米的神树,当可视为上古蜀人天地不绝、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同时反映了先民的太阳崇拜。

在亚欧大陆的另一边,自苏美尔文明以来,被称为“永生圣树”的“生命树”元素在艺术创作中也开始常常出现在国王或高等贵族的身边。这种以西亚地区的特色农作物“枣椰树”为原型的生命树,寓意着治愈、保护与庇佑的力量,象征着丰殖、生产、再生,成为一种重要的象征符号与装饰元素,一般以树干为中轴呈对称形式出现。在一块公元前22世纪的生命树浮雕中,乌尔第三王朝君主乌尔纳姆、苏美尔月神南纳分别在左右两侧,仿佛守护着树中的生命之灵。



王冠 巴克特里亚王国(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年左右)



商周人面鱼鸟箭纹金王冠带 金沙遗址

权力象征

200年,随着冶金工艺的迅猛发展,以及人们对金属制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大,金属材料不仅用于制作礼器,更多地被用于制作具有实用价值的工具、武器、首饰等。而这一时期,伴随着帝国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武力、权力的崇尚与追求愈加高涨。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王权象征物件,权杖与王冠则成了能工巧匠们重点打造的金属制品。

权杖,早在距今9000至11000年的前陶器时期,就出现在了安纳托利亚地区,并被作为随葬品由史前文明带入文明以后,两河流域更是出土了大量带有雕刻文字的权杖头,在宫殿建筑的浮雕之上,也多有国王手执权杖的形象表达。本次展览中展出的新亚述时期阿达德·尼拉里王铭文权杖头,便是其中的典型之一。权杖头属于棍棒类武器锤矛的尖端部分。将手柄插入其中后组成的权杖,是一种昭示权力、身份和地位的特殊器物。但其并非仅用于祭祀,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杀伤力,可以作为武器使用。权杖头顶部下方镌刻着的楔形文字写道:“……是他的主人,一切皆奉献给全知之王、阿苏尔之王阿达德·尼拉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权杖头首次使用了铁包铜工艺,青铜的躯干膨胀呈球根状,外表附着铁质,是人类进入铁器时代的生动例证。

相较于可以用于实战的权杖,王冠则是作为更加纯粹的象征物而存在,这也意味着,王冠在精美华丽的外形上,必然有着极高的追求。展厅当中,那件来自公元前200年—公元前2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的金冠,闪烁着熠熠光彩。这件金冠的制作工艺,以及使用橄榄枝叶做装饰,承载和体现了希腊风格金属工艺和艺术特点的传统。金冠中央处,还镶嵌了从阿富汗北部山岳地带的矿山上开采的青金石,十分稀有。

两河流域文明绵延数千年,形成了成系统的王权标识,而关于古蜀国中权杖与王冠的故事也同样精彩,甚至成为揭开古蜀文明发展脉络之谜的关键所在。1986年,一根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的金杖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这支代表着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的权杖,应为古蜀国地位最高的政治人物与宗教人物所用。最令人惊叹的是其杖身上的特殊图案:端头上,雕刻有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图像;杖内部,上方两只鸟头部相对,下方两条鱼背部相对,鸟和鱼的颈部各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射鱼纹”图案。巧合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王冠带上,也出现了鱼、鸟和箭的元素,有着相似的“射鱼纹”。这件金冠带呈等宽的圆筒形,带宽2.68厘米,厚0.02厘米,全长61.544厘米,重44克。带身纹饰构图精美,表面有四组相同的图案,每组均由一个人头像、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组成。于是专家推测,“射鱼纹”这种特殊的符号,很可能是王族的徽号。同样的图案出现在三星堆与金沙两个遗址中,反映出金沙与三星堆的统治者在族属上存在着同一性或连续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在青铜与铁之外,贵金属时代开始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鎏金、捶揲、篆刻、炸珠、凹雕等各式金属装饰技艺层出不穷,丝绸之路上,各国的商贸往来更是愈加频繁。于是,在交流互鉴的背景之下,在西方的古波斯帝国、希腊化时期的中亚诸国、贵霜帝国及萨珊波斯帝国形成极富美感的金属艺术风格的同时,盛唐、宋时期的中国也深受“萨珊式”“粟特式”金属器具的影响,并在学习借鉴中融汇创新,逐渐形成了东方风格,至今辉煌。在金属器发展的千年文明中,各地区和文明正是在不断传播、交流冶铸技术与冶金工艺的互通中,在相互借鉴发展的过程中,共同绘就了这一幅瑰丽璀璨的金属艺术画卷。



▲阿达德·尼拉里王铭文权杖头(公元前900年—公元前700年左右)
▼三星堆金杖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